

说出书

□何振华

当下对养老院及老人护理病房的“逆向保护”，家庭成员皆充分理解、积极配合。疫情终究会远去，团聚陪伴的时刻迟早会到来。在2023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刻，我愿以“岁老根弥壮，骀荡叶更阴”这句古诗，表达对你我白发高堂真诚的祝福。我相信，在新的一年里，更多白发不蹉跎，欢聚犹入少年丛，我们共同铺就灿烂美好的生活底色。

市场经济时代，出版社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是没错的，其次才考虑社会效益。郭敬明的书恐怕40岁往上的读者不会太多，但他有众多80后90后甚至00后的粉丝，出版社要的就是他的粉丝，出了他的书就能狠赚一把，何乐而不为。像钱钟书的《管锥编》这种艰深难懂的学术著作，除了少量古典文学爱好者或他的研究者，读者群体不会太大，有出版社肯出，只能证明这出版社有品位、有档次、有社会责任感。

范先生基于什么样的理由不愿意出书，是谦虚还是低调？我不清楚，但出版家自有出版家的眼光，把书稿他们是不是会放过的。作者自己这一面先把把关也有必要，如果出书不能有很好的经济或社会效益，不出也罢，戒掉了虚浮之气的同时也节省了纸张。

近代警政制度

清末将警政列入新政，似中外研究者一向赞誉的举措。但也有异议，如被誉为“近代科学报国的先驱者”杜亚泉。他认为：中国的警察制度，徒从形式“摹拟他国，似未适合于我国之情势”；西方城市人口多，“故有市街警察之制”，而中国“一二大都会繁盛之区，固可仿而行之；乃各府县之城治市集，亦复于数十武之内，植立武装之巡士；甚至乡村之间，亦间有之，……终日植立而无所事事”。警政“其费甚繁，其益殊少”应从“适于用”角度改革之，“则全国之内，所节必多”。倘若从“虑及官多生事之害”“感其事之无益，觉其费之可省”的视角分析，杜亚泉的异议似并非以“反对警政”而一言蔽之。

丽人 摄

从“马后炮”说起

玉兔咏春

癸卯大吉

陈永春篆刻